

韬奋人格发展的轨迹

潘大明著

TAOFEN

RENGEFAZHANDEGUIJI



韬奋人格发展的轨迹

韬奋人格发展的轨迹

潘大明著

TAOFEN
RENGEFAZHANDE
GUI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朱展程

韬奋人格发展的轨迹

潘大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3 字数 150,000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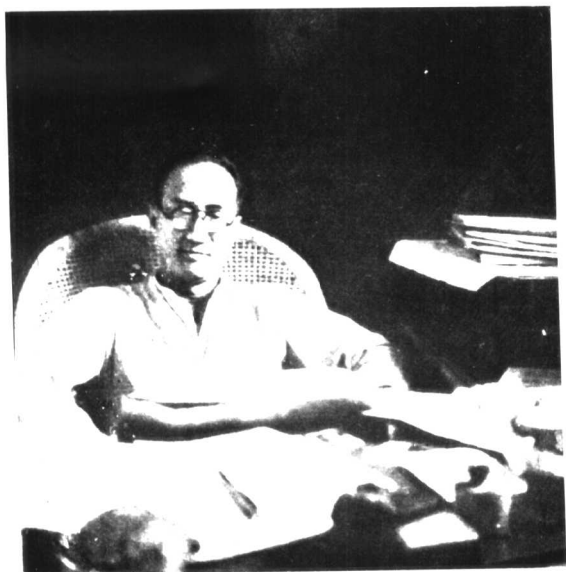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册

ISBN 7-5321-1686-7/1·1363 定价：15.00元



如果回眸仅是为了缅怀，那么残缺
的必然是对明天的思考。

潘大明 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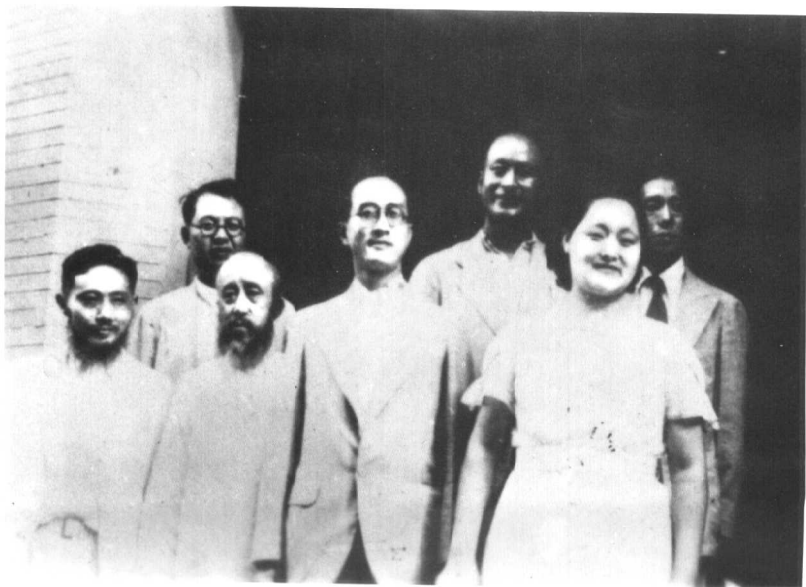
韬奋在书桌前写作。



韬奋出国时，朋友到码头送行。



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等在狱中时合影。



七君子出狱后合影。

目 录

一	现实和儒学对韬奋一生的影响以及 对韬奋的重新认识.....	1
二	传统伦理的危机和韬奋这一代知识分子 肩负的历史使命	18
三	儒学对韬奋人格雏形形成的深刻影响	32
四	韬奋对中西文化的兼收并蓄和自我更新	48
五	抨击旧道德制约下形成的社会腐败现象和 对新道德的宣传	89
六	“五四”以后韬奋人格的特征和理想人格的诞生.....	107
七	政治观的形成促进人格思想的发展.....	118
八	抗战思想的形成促使对原有伦理思想的怀疑.....	134
九	韬奋伦理思想第二次转换的进程.....	147
十	伦理思想第二次转换的实现.....	160
十一	抗战人格的形成和对以前伦理思想的继承.....	171
十二	韬奋自身的抗战人格实现和深层次的阐述.....	187
十三	韬奋对抗战人格的宣传.....	200
十四	结束语.....	206
	后记.....	211

一 现实和儒学对韬奋一生的影响 以及对韬奋的重新认识

韬奋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建永安。就在他出生的前几个月，清朝政府资深洋务专家李鸿章前往东邻岛国——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所谓的谈判。日方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拟好媾和条件，等着李鸿章签字画押，否则，不光全权大臣的性命难保，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在日军的攻击目标中。

史学家普遍认为《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使一个古老的帝国在政治、经济上更加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且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自此不再局限于中国的沿海地区，而进一步伸向广阔的腹地。列强们可以直接利用中国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掠夺更丰裕的利润。

条约的签订，为日本提供了巨额资金，促进它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政治上为日本逐步蚕食中国打开了大门，以致日本成为中国未来五十年间的头号敌人。

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与帝国主义以及腐朽的清政府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马关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回国内，全国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反对割地投降的抗议运动，各地报纸相继发表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卖国行径的文章。康

有为等 1300 多名进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发出拒和改良、挽救民族危机的强烈呼吁。

《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改良运动的开展,以康有为等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中国严峻的现实,挺身而出,要求变法,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变革行为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以维新派的失败告终,变法的内容绝大部分没有实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场变法,它对资产阶级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封建主义旧学的冲击,却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的影响,远比变法的某一具体内容的实现,意义要重大得多。

几乎在变法的同一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的浪潮,波及到直隶、湖北、江苏等十几个省,最终酝酿发展成义和团运动。

随着民族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不断加重,《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榨取,攫取更多的权益,从而必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

在民族矛盾不断尖锐的同时,中国一部分商人和地主官僚转向投资新式工业,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据统计,1872—1894 年的《马关条约》签订前的二十三年间,近代工矿企业大约有五十三个,资本总额四百六十多万元;《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受刺激,许多爱国人士认为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是中国摆脱危亡的一大手段,设厂自救、自办铁路、开采矿产、抵制洋商洋厂的呼声日甚,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1895—1913 年的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新创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商办厂矿企业有 463 家,资本总额达

9000多万元。也有记载表明仅1901—1911年各种新企业340家,资本总额1亿余万元。^①

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成为比洪秀全式的农民革命更有力的封建王朝掘墓人,直接促使清王朝走向灭亡。资产阶级在物质、政治、文化意识上经过一定时期的准备之后,必然要寻找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代理人,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保皇改良的主张转向反清革命,选择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1895—1911年,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变革之中,封建统治到了垂死阶段,不断与外来侵略势力相勾结,试图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民反封建专制统治和外来入侵的斗争不断高涨,最终迫使清王朝土崩瓦解。这是韬奋早年生活的主要社会背景。

在社会巨变中,韬奋的家庭也由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滑落到社会的底层,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祖父卸官归田、父亲官场失意,表面上家庭维持着大户人家的架势,实际上已是蛀空的门楣,日渐难撑。生活困难、窘迫,每逢没米下锅时,他的母亲便叫女仆去领取寺庙施舍的“仓米”。这一点,在韬奋中年时所撰写的《经历》一书中有着明确的表述。

然而,韬奋这个破落世家子弟并没有因为家道中落而对社会的进步失去信心,仍是希望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希望祖国从任人宰割的境遇中解脱出来。所以,他一旦感知到社会的新兴势力已发展并取得革命成功,便由衷地觉得高兴,站在人群中欢迎代表社会新兴势力的革命领袖的到来。辛亥革命胜利不久,

^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第407页。

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途经韬奋早年的生活地福州,韬奋便挤在人群中欢迎孙中山的归来,为能一睹孙中山的风采而雀跃。^①

中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不免具有某种表面性,他们由于畸型发育而成的软弱和妥协,决定了这场革命停留在社会的表层,社会根本矛盾并不能彻底解决。辛亥革命后国内处在复辟和反复辟的新旧势力较量中,复辟势力的背后是列强的干涉和封建残余在作祟。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出现了军阀混战和国外势力渗透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进入青年时代的韬奋已有了一定认识,他曾写道:“吾国连遭困辱,盖莫甚于今日矣。而争权夺利者犹未厌其欲壑,方且聚精会神于阊墙之争,祸乱相寻,无有穷期,乃至全国人民咸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皇皇然若大祸之将至。望诸政府而政府冥顽不灵,吾民哀号呼吁,曾不能感动毫末;望诸社会而社会沈滞灭裂之象莫可究诘……呜呼,吾国悲惨之象,思之惕然,心悸魄动。”^②

这里,扼要地介绍的是韬奋早年生活的时代,也就是韬奋思想形成时期的社会背景。韬奋的思想从启蒙到发展客观上无法摆脱社会现实对他的要求。了解这一段历史,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韬奋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他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那么,这种社会现实是怎样激发韬奋思想形成,并使韬奋要求自己在民族危亡日益加重的大势下,担负起民族的重任,求得民族独立、昌盛的呢?

应该肯定,社会现实是韬奋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这是客观的原因。就他的主观来分析,他认为社会与个人的命运联系在

① 穆欣:《邹韬奋》第6页。

② 韬奋:《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1919年11月25日《约翰声》。

一起,两者的利益不能截然分开,无法割裂而单一存在,片面强调单方的利益不切实际。比如说国家,它是由无数国民构成,其职能为管理、维护本国利益,一旦国家主权被外来侵略势力践踏,国家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能,国民遭蹂躏和宰割成了必然的结局。大致在韬奋思想启蒙时期,他对这一点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国之名誉大有关系一国之国民也”。不仅如此,青年韬奋还明确表示,“国家之盛衰兴亡,与吾青年之升沉荣瘁有密切之关系焉,其盛其兴,吾青年之受荣独至;其衰其亡,吾青年之受祸亦独惨。此对于一己,不可不負責任也”^①。

自觉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每个爱国者共同具有的思考人生的一大特征。韬奋能够自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认识人生,理论来源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或者说,这种思考方法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

韬奋6岁时由父亲为他发蒙,读的是《三字经》,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不可,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用来请一位老夫子。韬奋到10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1912年,韬奋离开福州,进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就读,后又升入公学中院(中学)。南洋公学虽以理工科为主,但是任校长的近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重视学生的国文学习,积极倡导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当时韬奋对理科的学习兴趣不太大,数学之类的学科靠死记硬背维持着体面的成绩,难以实现父亲要韬奋成为一名能够赚大钱的工程师的愿望。^②

① 韬奋:《论学生专务考试之流弊》,《学生杂志》1916年12月号。

② 韬奋:《经历》第10、14、156页。

韬奋重视国文学习,且展开研究,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学,还利用课余时间读完了《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等当时公认的传统文化的代表著作。^①早年所接受的文化教育,除去单纯意义上的启蒙智力、传授知识技能外,更多的是向韬奋灌输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观。故他曾称自己从小所接触到的是封建思想与旧礼教的那一套“熏陶”,影响匪浅。^②

封建教育从手段上来看带着野蛮的一面,它依靠强制的手段,向人灌输知识和人生哲学,体罚、死记硬背,忽略理解力的训练。韬奋尝到过这种教育的滋味。据韬奋自己回忆:发蒙的第一天,读的是《三字经》,一开始就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弄得莫名其妙,只能坐在客堂里死背,苦不堪言,后来读“孟子见梁惠王”时,父亲是用戒尺逼着,他才背诵出来。所以韬奋竭力反对这种教育手段,主张启发人的智力,加强理解力的训练,以达到获得外界知识的目的。他做过家庭教师、兼职外语教师,从没使用过这种残忍的方法,逼迫学生接受知识。

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向学生灌输的内容也有它的反动性,例如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保持皇权的高度权威性等等。大约在14岁时,韬奋和他的六叔国玖同在一处学习,一次六叔曾以“郭巨论”为题,要他写篇作文。晋人郭巨为奉养母亲,埋儿获金,从而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受到历代帝皇的推崇。韬奋认为郭巨之举太残酷,毫无人性,这种荒谬行为,长期被宣扬,酿成无

① 韬奋:《经历》第10、14、156页。

② 韬奋:《萍踪寄语》。

数杀人媚君的悲剧，遗害无穷。^① 这正反映了韬奋对封建教育内容违背人性一面的认识。

封建教育形式和内容上有它的糟粕一面，但是它所传导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讲究治术，面对现实，不脱离实际。同时又是理性的，主张有条件的变革，探索社会发展规律，通过自我更新、自我开放，以适应现实需要。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严酷现实一接触，构成近代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其中许多成分或因子，则直接向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和演化，如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祖国危难之际直接表现为“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韬奋小时候读《纲鉴》，看到晋朝的怀帝被汉王刘聪所虏，颧颜称臣，称刘聪为陛下，“汉主聪谓帝曰：卿赠朕拓弓银硯，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这不能不算是竭尽委曲求全之能事了！但是刘聪还嫌不够，“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帝着青衣行酒。庾珉、王隼等不胜悲愤，因号哭”。青衣古时系奴仆之衣，“青衣行酒”便是做倒酒的奴仆，庾珉和王隼都是晋怀帝的旧臣，所以看到故主的惨状，禁不住号哭起来。结果，不但两位号哭的旧臣被杀，就是甘为奴仆而不辞的怀帝，仍然被杀。韬奋小时候虽朦朦胧胧不知爱国为何内容，可读到这里，小小心弦为之震撼，一股莫名的凄惨滋味涌上心田，终身难忘。一旦祖国沦为殖民地，奴隶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这种念头直接来自传统文化，却是无法

^① 参见穆欣：《邹韬奋》第13页。

否定的。^①

近代史上许多杰出的爱国者,都如韬奋一样,深受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四”时期高呼砸烂孔家店的精英们也不例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哺育了他们,这是一个铁一样的事实。

爱国主义思想在韬奋心中的启蒙,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和探寻祖国愚昧落后的症结、希望祖国走上强盛发达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它的内涵也随时代发展而起变化,强调着它不同的侧重面。这一特点反映出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务实的传统,不尚浮华、讲究实效,正如《国语·晋语第十》中所写:“华而不实,耻也!”韬奋的爱国主义观非常实际,恐怕也是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形成的特点。

1914年,韬奋在《唐高崇文讨刘辟军士有食于旅舍折人匕箸者即斩以徇论》一文中提出“国小不足为患,民愚始足为患”的观点。韬奋并没有停留在发现国家落后症结所在这一点上,同时还探寻一条摆脱愚昧,使国家强盛发达的道路,韬奋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强国异于弱国者,学而已!夫学者,非伏案咿唔,无补于世之谓也。有法律之学焉、有工商之学焉、有农桑之学焉、有军事之学焉。人群有学,则文化进而国势兴;人群多数有学,则文化速进,而国势愈兴。”韬奋以“学”作为改变国家、民族愚昧落后命运的途径,而且认为大多数人“学”,才能促进文化的迅速发展,从而达到国家兴旺发达的目的。这里韬奋所说的“学”,延伸开来也可理解为教育,“学”为教育对象的行为。

^① 韬奋:《青衣行酒》,《展望》第126页。

韬奋认为普及教育、“开浚民智”，是“兴国振民一大要政”。后来，他几次三番地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国家之兴隆倾颓”，与“全国教育之发达否”有关，“吾国要图自强，振兴教育是免不掉的一桩大事”，指摘当权者不重视普及教育，酿成大多数群众不具有文化知识，阻滞了国家的进步和社会改良，不能“眼巴巴地随他拖下去”，^① 强国之所以发达兴旺，在于它的教育普及到了“聚精会神、图谋尽善”的程度。“教育救国”、“教育救亡”成了韬奋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1928年“济南惨案”后，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韬奋侧重强调民族团结、抵抗外国侵略，积极探寻中华民族摆脱危难局面的道路。韬奋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身上，但是在现实的教育下，他看清了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真实面目，把希望转移到人民大众身上，并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所制定的抗日政策，逐渐建立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摆脱愚昧落后的观念。

韬奋所持的爱国主义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起着变化的。他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内容表现为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铲除腐败的社会制度和没落的封建意识，确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造就一大批具有新人格的“新人物”，推进社会进步，达到振兴民族、强盛祖国的目的。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阻止英美势力向华北扩展，出兵侵占山东济南，制造“济南惨案”，韬奋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逐渐表现为呼吁民族团结，抗击外来侵略，他在自己主编的该年第33期《生活周刊》上，始用

① 韬奋：《教育群众的责任在哪里》，1920年12月20日《约翰声》。

大字标明“时刻勿忘暴强占济南的奇耻”，一直延用了两个多月。同时，还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团结努力，誓雪国耻”。在第34期《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中，他针对日本大阪的《日日新闻》出版关于“济南惨案”的特刊反映他们海陆军的耀武扬威和中国人的懦弱，发出我们子子孙孙不能忘这份“厚惠”的呼声。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排除私见，积极准备雪耻，否则“有何面目与世界各国人相见”。几周后，他又写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民，只有‘坐以待毙’‘任人宰割’的一途，这种耻辱，何等难堪。”

1931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长春制造了万宝山事件，紧接着又在朝鲜制造了枪杀旅朝侨胞的惨案，韬奋一针见血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的一部分，“实为积极侵略中之小波澜”，“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由一致对外而巩固国内，由巩固国内而充实御外的能力，全国一心，同御外侮”。^①同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他在八天后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一连发表了《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等4篇小言论，呼吁“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奋斗”，同时，对东北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进行揭露：“其实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极端无耻主义’”。

随着民族矛盾不断加深，韬奋的爱国主义精神突出了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并成为九·一八以后韬奋十三年生涯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里所说的是主要内容，而不是全部。他并没忽视中国之

^① 韬奋：《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生活周刊》第6卷第28期。